

二呆的素菜

□南京 梁平

儿时,我的浑号叫二呆。

上世纪70年代初,我10岁,家住朱状元巷,隔着丁家巷、止马营两条窄巷,便是老底子的南京清真安乐园菜馆。每逢礼拜天上午11时左右,必定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少年,捧着一只蓝边碗儿,雷打不动地穿过人群熙攘的两条窄巷,直奔安乐园菜馆。这少年就是我,因为话不多,表情木然,被街坊四邻视为呆头巴脑的娃儿,加之家里排行老二,便叫二呆。

父母双职工,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一个月中的两个礼拜天,外公照例会从长乐路来我们家走动。只要他来,母亲便会给我三毛钱,去安乐园菜馆炒一个素菜招待外公。对我来说,就等于过节了。其实这道素菜是最便宜的,也不过包菜、洋葱或芹菜而已,但油多,佐料齐全,香味直达心底,家里的煤炉再怎么用力也炒不出这样的味儿。每次去炒菜,女收银员撕下小票,便会冲着厨师喊一嗓子:“二呆的素菜!”厨师们看我憨厚,给我炒的素菜分量自然也比别人要多。

有一年秋天的一个雨天,我一手

拿伞,一手捧碗,刚走出菜馆,手一滑,碗就掉到地上,四分五裂,刚炒好的素菜也洒了一地。我知道闯祸了,急得脸上雨水泪水交织,趴在地上用手捧啊、抓啊,急得哭出声来。菜馆的那位收银阿姨看见了,她跑过来,把我拉进店里说:“二呆,没事的,我让叔叔再给你炒一份,借你一只碗先拿回去。”食客纷纷侧目而视,以为我是她亲戚呢!

好心的阿姨清扫了地上的碎碗,在食客诧异的目光中,重新捧上一碗素菜出了店。不同的碗,当然没瞒过外公的法眼。他悄悄向我问明情况,回家途中亲自去了菜馆,送还那只碗,付人家菜钱,拱手以谢!我那时年纪小,不明就里,长大后才明白,那只碗里其实承载着孝道、友善与诚信。

那些年每次给外公炒的素菜,外公其实也只稍稍动一筷子,其余大部分夹在我和我哥碗里。对外公来说,三代人围在一起吃饭,看我们狼吞虎咽吃得香,他老人家就打心底里痛快!

外公活到近90岁,他人生的最后几年腿脚不便,不行远道。我长大成人



后,家里生活条件大为改观,有时便会特意炒一碗安乐园的素菜,外带一盘牛肉送到他的床边。迟暮之年的老人家牙口不行了,但他咀嚼着一口素菜,脸上瞬间便有了久违的微笑,“还是以前的味道啊!”他说。

这些年,我常去安乐园菜馆吃素汤面,和下面条的季师傅成了熟人。我曾向他打听早年帮过我的那位阿姨,也问起当年的炒菜师傅。老季总是淡淡一笑说:“我们服务性行业,这种事多了去了!”

■点评:作者是南京日报名记,曾带过央视春晚的许多明星去安乐园吃饭,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古兰丹姆扮演者阿依夏木几乎每次来宁,都陪她在这儿吃饭。作者反而写了他自己刻骨铭心的儿时往事。也好,正是安乐园良好朴素的店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才有他每次请北京明星在店里就餐的行为。打碎一只碗,留下一片情,儿时的记忆,朴素的乡情,实际勾勒了南京百年老店的服务宗旨,也是文化底蕴,让人深思,发人深省!

——作家、资深媒体人 吴晓平

老刘的诗和远方

□南京 刘月雄

朋友的姐夫老刘,67岁了,4月份的某天,开始了他从南京到西藏的自驾游,历时25天。西藏,很多人向往的地方,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但藏区地域特殊,天气无常,路况复杂,突发情况猝不及防,单枪匹马如何应对?何况是年近古稀之人?我不禁心生好奇。他带着风而来,身形矫健,翻出地图说:“有生之年,就想东南西北绕一圈看看。”而西藏,无疑是他心心念念的诗和远方。

“家里人不担心吗?”“只说去青海湖,每天视频报备,然后走一步看一步”,他笑得有种小计谋得逞的开心。彼时,疫情警报刚解除,晚樱花盛开,他带着爱犬上了高速,所到之处,游人不多,祖国的大美河山,尽收眼底。看过少林寺的塔林,津津乐道于黄河壶口瀑布上的彩虹,致敬革命圣地延安,流连于中国最美的湖青海湖前,见识了盛产湖盐的茶卡盐湖。接下来,他辗转于大漠、戈壁、草原、无人区、雪域、高原,正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翻越祁连山,在张掖古城领略了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感受了万里长城西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的雄伟,忘返于鸣沙山上月牙泉的清莹,迷醉于翡翠湖中泛起的一池翠玉。

不过,里面导航仪不断地提示,回放了其路上的艰险:有翻不完的高山,爬不完的陡坡,转不停的急弯以及风沙卷雪、路面湿滑和险道落石,问题应接不暇。说起翻越色季拉山,忽遇冰粒夹雪,差点趴窝时,他仍是心有余悸。如此一路翻山越岭,顶风冒雪,终于抵达心中的圣殿,在布达拉宫前,他高举双臂欢

呼,那可是与梦想相拥的喜不自禁啊。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到底有多大?难道不害怕吗?他笑谈:“坚定信念,功课做好,开车时眼里有路,心中有地图,没什么好怕的。”多年的驾驶经验和不俗的驾驶技术是基本功,除此之外,车子保养、衣物增添、天气变化及线路调整,他都提前查看询问,熟捻于心。正是因为多问,得知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线遇雪封路,于是调整线路,翻越昆仑山,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看野驴闲适漫步;绕道玉树,回味了当年文成公主和亲格萨尔王的盛大场景,走进世界之最的新寨玛尼堆,体味藏民祈福的独特;在昌都的晚上,“睡觉时被子压得胸口好闷,一觉醒来,没事人一样”,体验了高原反应的来去匆匆。

他说得云淡风轻,不过是做了充分的准备;风景看过,才知世间所有的经过,都是人生的铺垫。

“青藏线和川藏线都走了一遭,足慰平生”,欣慰之余,老刘感慨地说,318国道正是十八军的英雄儿女,舍弃个人的安逸和幸福甚至生命,呕心沥血,前赴后继,铺筑而成。翻开历史,1950年前的西藏没有一公里现成的公路。通往西藏的新藏线、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公路,都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海拔高,地势险,可想而知,其修建是多么艰难万险的工程。这何尝不是伟大的铺垫,带着无数人的血汗、智慧甚至生命。人生长路,不枉这么多的铺垫,无论多么蜿蜒曲折,都值得我们坚定信念,与梦想同行,向未来攀爬。某天,诗和远方终将抵达!

苏州河

□武汉 朱辉

电影《八佰》的热映,催生出一批写苏州河的文章。我童年时见到的那条苏州河,或许是它颜值最低时的模样。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家住在河南北路,属于闸北区,“地位”低于一些有过租界的区。然而我们所在的里弄其实地段极好,走过苏州河上的河南北路桥,对面就是最繁华的黄浦区,南京路近在眼前;而另一侧的马路对面,是很有“档次”的虹口区。

由于居住、上学都在苏州河边,我每天都会无数次看到这条河。那时的苏州河,河水乌黑还漂着油花子。我没见过石油,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和那时的苏州河水差不多。

这样的河水当然散发着臭气,然而河上却有许多小船,航运很是繁忙。我们小学附近有个小码头,常年停靠着一些小水船。

那时的孩子不娇贵,我们常常去

码头上玩,有时还登上水泥船。那些船上的人以船为家,就在船舱里做饭。他们的日子过得清苦,最常见的下饭菜是榨菜皮子,也许皮子比整砣的榨菜便宜。看他们吃得很香,堆得高高的一大碗饭,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便对榨菜皮子产生了兴趣,常叫爷爷奶奶买了榨菜,把皮子剥了给我吃。奶奶笑我是穷命,后来果然一语成讖。

那时的苏州河,最热闹的是夏天。每天傍晚,桥上都会有一些打着赤膊、穿着三角裤的勇士,“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桥面离河面不过四五米,倒没什么难度。令人咋舌的是,他们竟能在这么脏臭的水里游得很开心。

那时的我,每天傍晚和爷爷一起沿着苏州河走到外滩黄浦公园,再走回来,一个来回只要半个小时。沿途经过的河滨大楼、上海邮政总局,如今都是文物保护单位。河滨大楼

曾是亚洲第一公寓,上海邮政总局大厅曾是远东第一大厅。印象最深刻的,是曾跟着爷爷去邮政总局大厅拍电报,第一次见到巨大的落地玻璃,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四川北路桥上的车与人,别有一番意境。

2006年,我带着妻子故地重游。此时我童年时住过的石库门房子,已经被拆成了残垣断壁。而苏州河早已成了一条景观河,河水碧绿清澈,着实惊呆了我这个曾经的上海人。能将这么长一条“黑河”变了颜色,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做到。

有位文友喜欢写苏州河,这类文章发得比我好得多。他其实从未去过上海,都是根据王家卫电影,凭着感觉想象出来的。我想我得填补这一空白,不然对不起童年曾在苏州河边度过的十几年。而且没有黑哪有白?了解曾经黑乎乎的苏州河,更能让人感受到中国的伟大,短短三四十年来,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渠荒新叶长慈姑

□仪征 王晓

故乡人勤快而聪明,田垛沟渠旁铺上断砖碎瓦,从村里走到田边,脚上都不沾一点泥,他们像园林工人美化城市一样装点自己的乡村。

稻田旁、水渠边还见缝插针地栽上了慈姑,随处可见。

我是国庆假期回去的,稻子有七八分熟了,穗头沉甸甸的,腰有点弯了,秋风里沙沙齐唱丰收的歌谣。一眼望去,田野像一粗心主妇,把绿绸衫和黄土布揽在一起洗,出水时一看,有点傻了,黄非黄,绿非绿,藏也藏不住了。

慈姑呢,正绿得起劲儿。每株两三茎,亭亭地举着,箭头似的叶子发着碧玉的光泽,脉络清晰,映在水里的影子,简洁清瘦,不象荷的富态,芋头的肥硕,颇似现在的“骨感美人”。慈姑“骨感”,却不羸弱,翠绿欲滴的茎叶流泻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有个性,不张扬。

“快看,慈姑花!”我拽着爱人的袖子提醒他。

“慈姑会开花?!”我就知道他不知

相信。其实不只他,生在水乡、长在水乡的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慈姑开花。是慈姑开花静悄悄,不愿让人知道?还是我从未留意过它?若是后者,我很遗憾错过无数次美遇。

往水渠边探两步,确信不会滑下去,让爱人拉着我的手,我斜着身子去够那夹在茎中遮在叶下的慈姑花,一池的慈姑只开了这一枝花。

细看,慈姑花的造型有点像禅杖,可知它是超凡脱俗的花儿。一寸左右就环绕着三根小枝,向外面伸展着,一圈一圈,从底部往上,宝塔状。每个小枝的末梢都有三个花球,或开或苞。花形像极了水仙,几难分辨。三个白色的花瓣像银台,一撮黄色的花蕊像金盏,金盏银台说的是水仙花,也是慈姑花。

我一直就喜欢热情奔放的迎春花和淡雅素洁的水仙花,之前我不知道同时喜欢两种花的原因,直至看过小城仪征孕育出的诗人忆明珠的文章,我才知道喜欢的内在原因:它们都所需极少,一抔土,一盂水,

足够恣意忘情。再则花期合心,迎接春天,装扮节日。

我家每年春节前都要养一盆水仙,去花鸟市场买一个慈姑样的水仙球,回来修理一番,放进一只广口的白孟内,倒上些水,不再管它。过节的时候,水仙开得欢,花株顶上缀着许多“金盏银台”,葱绿的叶子四面散开,为了让水仙能亭亭直立水里,我常用一根红丝带拦腰搂着它们,过节张张热烈些也无妨啊。一根红丝带衬托下,过节的气氛就出来了。学美术时,老师告诉我们色彩搭配的技巧,其中有一句:红配绿,丑得哭。其实也不一定,家人都喜爱扎了红丝带的水仙。

我这样猜测,慈姑与水仙至少应算近亲。只不过慈姑更见野气和清纯。郑板桥在《扬州祝枝词》里说:“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在故乡栽花与种田分得并不那么清。种慈姑也算栽花。清晨的薄雾里,田野浸在牛乳里一般,我捻着一枝慈姑花微微地笑。

《夺冠》带我重回1981

□南京 王慧琪

看完陈可辛导演的新片《夺冠》,久久不能平静。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以近乎玩命的精神险胜日本而夺得世界冠军。影片再现了这段令我们这辈人血脉贲张的历史,再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太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一种真实的心理。

是的,时间倒回到1981年,那时候的我们就是这样,从穿着到思想,都很朴素甚至守旧;心地也单纯,单纯如一张不染色的纸。几十个人围在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旁,屏住呼吸,跟随郎平、孙晋芳、陈招娣她们一起跳跃、拦网、扣杀,她们倒地失球,我们为为之叹息;她们得分相互击掌,我们也跟着一起快乐、欢呼,甚至流泪……包括那些敲锣打鼓上街庆祝的镜头也都是这样一样的,真真切切。当时的人看起来很土,甚或有点木头木脑,但心却是滚烫的,所有脸上的表情都鱼一般活泛生动。不装,不会装。

回想1981年,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了,在一个县里干共青团的工作。经常下乡和乡村年轻的团干部一块劳动,也一块歌唱。从县城到某一个僻远的乡,乘农用公交要好几个钟头,路不好,

屁股会颠得发麻。但那时候人年轻,不觉得累。团干部里交了不少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悄悄话都愿意跟我说。不久前遇到一位当年的老团干,说起有一次我们在市里办培训班,休息日举行拔河比赛。县与县比,我当时带队的团干们拔得十分卖劲,好像还拿了第一名。这事他不说我都忘了。当年那些乡村团干也都跟郎平、孙晋芳差不多的年纪,凑在一起总叽叽喳喳的,田野里、场头上,青年突击队的旗子呼啦啦地飘着,每个人的怀里都像揣着火呢。

那一段让人忆起便心潮澎湃的历史,已经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定格。

显然,影片《夺冠》不光是为了引发一批老人的集体怀旧。它通过中国女排的代表人物郎平自身的成长和对体育精神领悟的不断蜕变,引申出一个更为开阔也更贴近近新的时代的审美命题——运动员打比赛争冠军并非生活的全部,充分地享受体育运动本身,或许才是更重要的。

但影片之于我,之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可能更多获得的还是一种重返青春的感动,和再也回不去的感伤。